

嵌入与浮出:媒介视角下 驻村干部日常工作中的沟通交往

余沐芬 杨萌芽

【摘要】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叠加着新媒体的普遍化发展,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离不开传统的沟通与新媒体介入。借助传统的沟通方式,驻村干部消除了“干部”与“驻村”之间存在的疏离,得以融入乡村并奠定开展扶贫工作的基础。借助新媒体的连接属性,驻村干部得以跨越不同空间以对接资源的供需,也重构了乡村社会对交往空间的理解和共同体意识。基于对河南省58名驻村干部的深度访谈及其日常工作的参与式观察,媒介在驻村干部的身份嵌入、资源获取及乡村公共空间构建等方面都传递出新的意义。同时,乡村治理中的连接与互动、传播效果内卷化及适应乡土媒介的建立等问题值得反思。

【关键词】乡村振兴;驻村干部;媒介化;媒介使用;内卷化

【作者简介】余沐芬,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杨萌芽,河南大学融媒体中心研究员、副教授。

【原文出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京),2021.4.28~3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移动阅读用户社交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项目编号:20YJC870009)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缘起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变革发展的阶段,传统乡村社会内部面临着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以及共同体塑造的挑战。^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而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驻村干部从中央、省、市、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下派到农村,不仅为农村传递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带去了各种资源,帮助农村脱贫致富,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

进入21世纪,人类通过互联网实现广泛而深入的连接,“媒介——或者更广义地说,信息的传递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②无论干部还是民众都无法脱离当前的传播环境决策或行动,媒介化已经成为研究现代社会的基本背景和分析语境。

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本文为代表的广大中西部农村仍然面临着劳动力流失、村庄边界消解、村干部群体重组、村庄集体力量塑造等问题,现代化的体制尚未在乡村建立,传统习俗及社会关系的力量依然强大。因此,驻村干部的沟通交往很难抽离乡土化的语境。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探索驻村干部角色身份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在此基础上有没有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提高驻村干部治理能力,寻求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思路和建构本土化政治传播、乡村传播理论的尝试。

二、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媒介、乡村与驻村干部研究

针对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最早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帕克对移民报

刊及移民化过程进行考察,随后丹尼尔·勒纳、韦尔伯·施拉姆等学者关注传播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前者从符号互动论出发,后者则从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扩散角度出发。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遵循“现代化范式”,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过渡到批判理论阶段和强调平等民主的参与式传播理论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学理论进入反思及本土化的过程,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学术实践也经历了方法和路径的转变,进一步来看,媒介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技术层面将大众传媒看作乡村治理的工具,二是在制度层面将媒介视为乡村治理结构的塑造者。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介与乡村治理的研究集中在对宏观治理模式的考察和对媒介角色的探讨,对治理主体与媒介的互动层面涉及较少。

媒介视角下驻村干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基层干部的媒介实践已有较多探索,研究主要聚焦于干部媒介素养问题。驻村干部的研究则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领域,从制度建设、治理实践以及工作困境等角度展开。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媒介、驻村干部与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所采用的仍是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功能主义范式,缺乏对于个体、媒介与治理关系互动的微观考量。

(二)站在“十字路口”的驻村干部

驻村干部指驻扎在农村,领导村两委推动农村工作的外来干部,他们充当着沟通上下、连接内外的角色。自2015年,中央首次下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

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通知》,明确提出向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派驻优秀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确立认真落实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主要职责。本文的驻村干部指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背景下的群体。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借助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将河南省林州市、孟州市、新郑市三个地区58名驻村干部作为研究对象。这三个地区分别位于河南省的北、西、中部,虽不能反映整体情况,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普遍经验的获取,而是个案的阐释。

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2019年1月2日—10日,2019年12月15日—20日和2020年1月9日—14日,分别在林州市、孟州市和新郑市访谈34位驻村第一书记。此外,从2018年7月至8月和2019年3月至11月,分别由调查组成员对河南洛阳、开封、濮阳等地区驻村干部进行分散式访谈。为更全面了解驻村扶贫工作,获得多元的视角,同时对某市宣传部副部长和扶贫办主任进行访谈。笔者也在线上和驻村干部展开交流,以匿名身份加入部分扶贫工作群,观察他们朋友圈展示的内容。访谈对象情况如下表(因版面有限故只选取部分代表)。

四、研究发现

传统时代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形塑着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但在媒介“穿透”的社会中,“非媒介的社会机构依据媒介逻辑调整自身社会行动,从而融入媒介化的社会”,^③因此驻村干部在日常工作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原单位	职务
1	N县中医院	职工
2	L市扶贫办	职工
3	A市广播电视台	职工
4	省对外友好协会	职工
5	A市文广新局	职工
6	省航投集团	职工
……	……	……
54	M市扶贫办	主任
55	M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56	A市T县X村	村干部
57	F县S村	村支书
58	G市H镇B村	妇女主任

中不仅汲取传统的治理资源,也需要将媒介逻辑纳入治理思维中,媒介包括新媒体也包括依靠面对面对交流的“旧媒介”。

(一)“嵌入”乡村:驻村干部的角色融入

嵌入(Embededness)即个体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去进行原子式的决策和行动,行动者的行为总是有目的地“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④传播学视角下的“嵌入”关注媒介技术和使用行为是如何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历史、社会和文化之中的,^⑤驻村干部“嵌入”乡村蕴含着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如何融入乡土社会,获得被接纳的身份。

1. 入场:会议与文件

新媒体覆盖了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会议传播与文件传播仍是驻村干部权力进入乡村的重要方式。

会议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商议事情的集会”,驻村干部通过会议宣传扶贫政策、加强党建工作、开展先进表彰,依托官方手段在乡村建立形象与权威。作为传播媒介的“会议”一般从市到县到乡再到村,层层递进式传递。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社会的下沉,视频会议、微信群会议逐渐成为代替面对面开会的新方式。

文件作为会议的成果,需要下级继续学习、讨论。驻村干部将上级文件规定的抽象工作目标具体化,再把工作结果逐级向上汇报,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过程。但由于传播环节太多,可能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

2. 融入:走路、吃饭和闲谈

中国自古以来是乡土中国,有约定俗成的人情礼俗和行动逻辑,尽管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现在被更为精准地描述为“半熟人社会”,^⑥但真正融入一个村庄、取得当地人信任并建立起权威,依靠会议和文件等组织化传播的“入场券”,很难勾连起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系。

“刚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大家也不接受我,后来去得多了,大家就知道我是真心来办好事的。县委书记来这里调研的时候,从几百户里选出来最贫困的48户了解情况,我跟书记说,你跟着我走访这48户,不会走冤枉路、不会走回头路,也不会落下一

户。挨家挨户的情况我都可以介绍清楚。”^⑦

入户走访,直接面对贫困户,是驻村干部进入乡村的必要手段。扶贫政策落实、贫困家庭状况以及共同情感建立都包含在“走”的过程中。“我很少通过微信来说事情,很多时候你这件事说了一大堆,那边看完之后说‘哦’,根本没人搭理你。”^⑧当提到社交媒体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困难时一位驻村干部如是说。

“饭市”被认为是一种村落公共空间和传播现象,^⑨在吃饭过程中,村民对于本村人、事、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的谈论,实现传播互动中“共识”“通感”以及“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驻村干部能否与村干部、村民一起吃饭不仅是干群亲疏的体现,也是驻村干部被纳入村民共同生活场景,身份被信任接纳的标志。

“原来我们这个村两委班子很涣散,村支书习惯一个人说了算,但在村子里搞一言堂是不行的。后来我经常和他谈心,没事在一块吃饭,跟他讲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办事也要按规矩来,这也是分担风险和责任,慢慢他的思想就转变了。”^⑩

饭桌文化折射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乡村具有“平民色彩的公共空间”,又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农村家庭的“后台”。如果说会议中的村民是“前台”般的存在,对于“外来者”驻村干部的吃饭邀请则是私人领域的敞开。

Holmes认为闲谈(small talk)作为缓和过渡的话语策略,能建立、维护和加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缩小上下级之间的社会距离。^⑪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也贯穿着“闲谈”。

“首先要跟支部书记聊,在思想上沟通,寻找契合点,抓住这样一个人的基础上,逐步跟两委或三委班子聊,有意无意地灌输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然后就是和拆迁钉子户和出租车司机聊,后来他们都表示应该早点聊。”^⑫

闲谈中,首先,驻村干部的身份地位得以确立,“在聊天过程中,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点,时时刻刻认清自己”^⑬。其次,闲谈也起到获取村庄内部信息和润滑交际的作用,“晚上大队村部有人跳广场舞,咱就跟着人家学学,在一起慢慢关系就更融洽了,东家长西家短无形中就知道了在聊天中就把一

些信息获取了”。^⑩最后,会话双方对立或紧张的气氛和关系也能通过闲谈缓解,如驻村干部与拆迁户、出租车司机彼此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

(二)资源赋能:扶贫工作中的媒介逻辑

赋能(empowerment)也被译为赋权、激发潜能,一般被认为是增强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过程。乡村振兴的短板之一是资源短缺,在扶贫工作中的赋能是指驻村干部借助新媒体实现自我能力提升和调动外界资源,以助力乡村振兴。

新媒介技术不仅作为促进并延伸沟通能力的工具,还能够增加和汇聚社会资本,引发新的人际关系,帮助构建社会身份,成为获取支持的潜在来源,无论是“用微信朋友圈建起来”的三宝图书馆,还是技术支持下的社区微平台,在乡村治理中,资源的外接内引越来越体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1. 自我赋能

不少驻村干部在工作能力和知识获取上感到焦虑,一些驻村干部借助新媒体实现个人层面的增长。

“我经常用腾讯 App 看新闻,同时在喜马拉雅、得到、探知上都买了一些课程,来学习充电,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内容,对我帮助比较大。”^⑪

媒介赋权为驻村干部工作能力的提升带来便利,他们利用新媒体学习新技能,化解因缺少时间和资源无法提升工作能力的问题。

在相对较为封闭的工作环境中,朋友圈为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提供平台,帮助搭建和拓展资源渠道、调动线下社会资本。

“中山大学一个在读博士研发了一个移动党校,我们俩原来是通过五四青年表彰会认识,互相加了微信。后来我朋友圈的驻村事迹感动到他了,他捐给我们村一台移动党校,可用来做党建。通过关注一些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⑫

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干部较易获取支持和各种资源,在这种正反馈的激励下容易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不过调查发现,这样的驻村干部为数不多,多数人对新媒体抱有观望态度。

2. 村庄赋能

Z村的儿童图书馆已经建好了,回忆图书馆的建

设过程,Z村第一书记表示“这是一个大家用朋友圈建起来的图书馆”。驻村期间,他看到一个孩子在墙角静静地看书,萌发了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想法。他首先通过个人公众号发声,随后一位天津的企业家和他取得联系,“他通过我的朋友圈和我写的文章,觉得我做的这些事非常有价值,决定支持我,前前后后打来了好几次电话,既然人家这么诚意,我也接受了”。^⑬在原单位的支持下,Z村收到X集团捐赠的价值20万元的图书、电脑、电视和空调等装备。这位第一书记认为,扶贫不是博取别人同情心,捐钱对个体的帮助并不大,要多做惠及更多人的事情。

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第一书记通过朋友圈、抖音等平台记录与发布装修过程的动态,并就图书馆装修风格、书籍分类等问题与村民和网友展开互动,借助新媒体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三)情境建构: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与交往

“公共领域是能够保证他们自由集会、聚会、自由表达观点,进行沟通交流的场所。”^⑭尽管“公共领域”的概念不能完全移植和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但依然有相似之处。乡村社会的集市、庙宇、树下等公共场所,是村民讨论村庄事务、交流沟通的空间,但由于国家权力向基层的逐渐渗透和现代性对于村庄秩序的影响,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逐渐减弱。新媒体在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维系乡村社会秩序上有一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不仅是物品和信息渠道,还是一种情境。

1. 微信群

村庄微信群的建立重新连接起漂泊流动的村民,实现传播信息、人际沟通、情感交流和讨论公共事务的目的。微信群建立容易,但群内长期秩序的稳定,需要专门管理,访谈发现,驻村干部及活跃的村干部、乡村精英担当了这一角色。

“不仅有本地村民,群里还加入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员,他们平时在群里交流和提意见。在村委换届过程中,我及时将相关信息通过微信群传播出去,公布相关人员名单,让在外打工的人员参与进来,并解答他们的疑虑,通过微信群监测换届过程中的意见,线下再找他们聊天,协调解决。”^⑮

微信群成为村民分享信息、讨论问题和闲聊的

空间,处于不同时空的村民情感维系得以实现,乡村记忆获得新的承载空间。驻村干部与村民实现了“共同在场”,惠农政策、扶贫信息、相关文件通过微信群得到便捷传播,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

2. 社区云平台

除微信群外,数字社区公共平台也成为形成村庄舆论、发起公共行动的重要场域。“互联网+乡村”项目推动下的S寨社区云平台,分为“智慧党建”和“社区服务”两个区域。云平台由驻村第一书记提出建立,并联合党员村干部共同管理。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有1000多人,比如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坏了,直接拍一张照片上传,说在什么位置,后台就能派人及时修。再比如了解村民的结构,30岁到40岁之间的人有多少,这样能够做到信息精准发放,村里需要社区服务,我就专门针对这部分人发通知,其他人不会收到,保证不扰民,乡村治理方针政策的落实也有针对性。”^③

尽管云平台的建立并不能完全解决村民原子化、村庄失序等问题,但它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村民,强化村庄共同体意识。传统权力结构结合移动网络平台为村庄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可能性,无疑是数字化时代驻村干部对于乡村治理的有益尝试。

五、媒介视角下驻村干部的治理反思

互联网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媒介化”是驻村干部不可回避的工作环境。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概念依然适用于现在,“流动的空间”使驻村干部得以“身居村之内,触及千里外”;“无时间的时间”则认为当下“移动的时间”可以进入任何一段社会活动中,事务的处理变得不间断。因此,驻村干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时空压缩下的紧张感与焦虑感,新媒体技术引发的新形式主义亦需要警惕。乡村治理中的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谁在传播:扶贫工作中的主体

在乡村治理问题上,我们常常着眼于“怎么治理”,而忽略了这是“谁的乡村”。只有村民、村干部获得主体性地位,减少“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实现“村人治村”,才能真正激发乡村内生性动力,找到未来发展的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中也明确提出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

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中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国家政治目标和乡村社会诉求之间存在一个中介者。扶贫办、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是扶贫开发中的三大行动主体,驻村干部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建立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内生于乡村秩序中的村干部不可忽视。

“带不走的工作队是什么工作队,可不是我们第一书记,是村两委干部的队伍。能发挥他们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作用是我们第一书记最大的功劳。村人治村,好多事情不是驻村干部不愿意干而是他们的土办法和经验更管用。”^④

这位驻村干部对驻村工作的理解耐人寻味,驻村是非常态性的制度安排,扶贫是特定环境下的工作,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可以形成团结合作的关系,共同推进乡村建设发展。如果过于依赖外部的资源与权力,一旦发生危机,乡村发展依然面临困境。

(二)关系建立:连接与互动的平衡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过去的弱连接变为强连接。新媒体降低了传统时代关系建立的成本,驻村干部与村民、村干部、上级部门的连接变得触手可及,但强连接并不意味着强互动。乡土社会中人情网络关系复杂交织,仅靠线上的连接很难拉近现实中人与人的距离,驻村工作要求落实到户、落实到人,精准脱贫概念中“精准”的意义也在于此。驻村干部与村民和村干部建立的应是一种强关系,这层关系中不仅需要强连接,还需要强互动。

(三)跳出“内卷”:治理中的传播效果

“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最早提出,用来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在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换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即没有发展的增长。^⑤从传播的视角来看,新媒体覆盖下的乡村,尽管信息规模和渠道种类不断增加,但传播沟通的效果却有待考量。

农业税取消以后,国家、乡村、农民、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乡镇不再深入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公共事务中去,村干部回应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乡村内外的传播沟通机制也相应发生改变。首先,村干部从乡村具体事务中退出,农民对村干部的情感依附逐渐减弱,双向不信任瓦解了人际传播

的效果;其次,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农村信息传播的基本格局,农民认同呈现在新媒体上抽象意义的“国家”,而排斥怀疑国家具体化身的乡镇府、基层干部,“交流的无奈”考量着乡村治理中的传播效果。

(四)适宜乡土:乡村内生性媒介的建立

“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即传播只有和地方共同体发生真实的关系,才能真正被受众接受,传播就是凝聚地方共同体经验的精神建构和文化再造”^②,乡村治理下传播系统的构建不是移植和复制现代化技术和新媒体,而应该寻找到适宜乡土的媒介。

当媒介抵达乡村社会,无论何种媒介形态,对于乡村面貌的呈现都应当以人为尺度,将内部与外部、传统与现代的内容整合起来,体现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正如麦克卢汉所构想的那样,技术应勾连和平衡新兴社区,并成为社区治理的动力,驻村干部在利用直播、短视频展现乡村面貌时,不仅仅是对田园风光的选择性的呈现,而且应该关注当地人在媒介中的互动参与和自我表达。进入乡村的新兴媒介如果只带有都市商业气息,诉诸于休闲娱乐与猎奇的乡村生活,那么乡村话语看似是充分的表达,实则是更加加剧的失语。

六、结语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乡村成为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对驻村干部日常工作中的媒介实践进行考察,发现他们的媒介实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呈现出“嵌入”又“浮出”的特征。一方面,“媒介化”已经成为驻村干部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沟通表达与公共空间的建立,都深深打上了媒介的烙印,日常工作中的驻村干部很难脱离媒介作出决策和行动;另一方面,“乡土化”仍是驻村干部面临的治理环境,他们的沟通交往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嵌套在一起相互制约影响,融入乡村的过程很难脱离当地的社会语境。旧的传播方式并没有消亡,驻村干部藉此获得“嵌入”乡村的入场券,实现身份认同和接纳,新兴媒介则帮助驻村干部建立上下沟通和外源内引的桥梁,激发乡村社会主体性和内生性,完成既“嵌入”又“浮出”的过程。

未来中国乡村应该遵循怎样的道路,在何处安

放,现在还无从得知。然而,媒介技术的发展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已是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不仅是驻村干部,每一位治理者都应把握好时代脉搏,与时代共振。

注释:

①贺雪峰:《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求索》,2017年第10期,第10页。

②③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48、152页。

④臧得顺:《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0页。

⑤孙信茹、段虹:《再思“嵌入”:媒介人类学的关系维度》,《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06页。

⑥贺雪峰:《治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⑦2019年1月对N县Z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⑧2020年1月对Y县Z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⑨陈新民、王旭升:《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第63页。

⑩2019年1月对H镇M村驻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⑪Holmes J. Small Talk at Work: Potential Problems for Workers With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 36, no. 1, 2003, p. 65.

⑫⑬2020年1月对S寨社区第一书记的访谈。

⑭2020年1月对C乡M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⑮2019年3月对L乡M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⑯2020年1月对G镇Q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⑰2019年10月对Q县Z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⑱[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版,第225页。

⑲2019年10月对D县L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⑳2020年1月对S寨X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㉑2019年1月对T县H村第一书记的访谈。

㉒“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延展,用来指农业生产内部劳动密集化、系统内部精细化和复杂化。

㉓[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